

重本·崇礼·尚实:论刘宗周的讲学 活动与教化特质

冯前林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证人社乃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创建,在其讲学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他还于大善寺、解吟轩、石家池、韩山草堂、东林书院、首善书院讲学。刘宗周的讲学,旨在教化。他重视未发工夫,强调源头处的洁净精微;同时认为谨守礼仪规矩会对为学成圣有促进作用;此外,反对顿悟空谈,主张实修躬行。刘宗周的讲学实践与教化思想对于家族、门人、浙东学术皆有较大影响,其亦可为现代教育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刘宗周;讲学活动;教化特质;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21)03-0114-08

刘宗周(1578~1645)作为晚明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当时以及后世都颇受重视,现代新儒家之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思想家称其为“宋明殿军”,他的讲学教化活动与其慎独诚意思想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从大善寺、朱绵之解吟轩、陈敬伯石家池屋舍、族兄韩山草堂、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到与陶奭龄创办的正式书院证人社,刘宗周孜孜不倦、循循善诱、宽严并济,引导从学者成为真正的人,即教以成人、学以成人。刘宗周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五官百骸之灵秀,而在于“仁”,仁则为人,不仁则非人。概言之,他的教化思想具有注重未发工夫(重本)、重视礼仪规矩(崇礼)、强调笃实渐修(尚实)特点。家族、门人、浙东学术受刘宗周之影响,都有相应之转变。

一、刘宗周的讲学活动

明代尤重讲学。吴震先生言“在16世纪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时代风气。甚至可以说,讲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主要话题。”^{[1][P3]}但是到晚明,讲学活动已经不复旧日之生机勃勃,而是趋向没落。尽管刘宗周在明代讲学史中的地位与王阳明不可同日而语,讲学实践的地域范围除了北京的首善书院与无锡的东林书院以外,基本

是在绍兴,但其在晚明,仍然在家族、门人以至浙东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早期的讲学活动(万历三十五年至天启五年)

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在刘宗周而立之年,他于居丧之暇(注:外祖父章南洲与祖父刘兼峰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去世),在大善寺开始授学,给同族的亲戚眷属讲授举子业。刘宗周的教学之严格从此时即有体现。学者的出入进退都有规矩尺度,并不因是同族闲暇讲学而略有松懈。对于旷学者以及不受教者,皆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或以长跪,或以鞭策。当时普遍师道衰颓,世风不振,因而大家都惊异于刘宗周之“严毅”。其实,“严毅”贯穿了他的一生。至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公元1608年),刘宗周因病辍讲,卧病静养凡三年。其间,倚第授二女以小学之礼,亦是规矩甚严,“每晨夕问安侍膳,敛衽正容下气,不命之退,不敢退,宛然内则之仪焉”。^{[2][P238]}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刘宗周与东林人士刘静之相约杭州西湖,就“求仁”“主静”“修悟异同”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刘宗周过无锡拜访东林书院高攀龙,相与请正。东林书院自万历三十二年(公元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03);山西省研究生教改项目(103544901036)

作者简介:冯前林(1984—)女,山西离石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研究。

1604年)修复完成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讲学者,“岁集友士为会,至者尝千人,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3] (P407)}刘宗周亦为其中之一。《明史·刘宗周传》记载蕺山为学经历“宗周始受业于许孚远。已,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辈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之会,宗周亦与焉。”^{[4] (P6573)}他与东林书院及东林党过从甚密,同时其学问思想亦受东林成员的诸多影响。黄宗羲、邵廷采等言及蕺山学问历程之时,亦皆言及东林,邵廷采称其:“博取精研,归于自得。”^{[2] (P539)}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刘宗周38岁,名声日隆,“青年多信为真儒”。^{[2] (P238)}“真儒”之称自然由刘宗周之真言行累积而成。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刘宗周养病期间,会稽县令赵士谔欲与之结交,他淡泊名利,并不应允。赵士谔以问疾为由直至榻前,惊叹于他的清贫。万历四十年四月(公元1612年)刘宗周于江西建昌的益藩册封礼充当副使,辞谢百金酬礼。且自万历四十年三月(公元1612年)入朝为官,不管是上疏皇帝还是上书高级官员,皆辞气切直,无丝毫阿谀逢迎、虚与委蛇之态。因而陈尧年率二十余人执弟子礼,刘宗周授徒讲学于门人朱昌祚的解吟轩。朱昌祚,字绵之,是跟随刘宗周最早、最久的门人之一。他朝夕不离先生左右,学有自得,造诣深邃。绍兴文史专家黄锡云、傅振照《蕺山弟子考》文对朱昌祚之介绍恐有误,《考》文言:“字绵之,绍兴府山阴县人。官至巡抚,清嘉庆《山阴县志》记有绍兴镇将姚承德……病且革时,部院赵廷臣、巡抚朱昌祚至卧榻握手慰劳之,卒后哭吊。”^[5]朱绵之实非官至巡抚的朱昌祚,浙江巡抚朱昌祚乃山东人士,字云门,出生于1627年,晚于蕺山弟子朱绵之。在蕺山弟子朱昌祚(字绵之)跟随其师学习之时,巡抚朱昌祚(字云门)尚未出生。此番解吟轩之教学,刘宗周除了贯彻儒家一贯以德行为重、文章次之的宗旨之外,特别强调外在礼仪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时之世,礼教荡然,士人猖狂而无忌惮,骄惰而无自修,子弟悖逆父兄,幼卑藐视师长,社会陷入混乱的失序状态。因而,学者为学须自学“礼”开始,日常的言语动作都自有规矩尺度,天长日久,则内化于心,心性自会有所收敛。在他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亦以“礼”为重。比如,即使酷暑难当,门人仍须冠服庄重,切不可随便、浪荡。如有行为放肆而不遵礼仪规矩者,则逐出门外。

陈尧年,字敬伯。他与朱绵之一样,都是跟

随刘宗周时间较长的早期弟子。陈敬伯居住于石家池,刘宗周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至万历四十五年春(公元1617年)在陈敬伯家中授教。他与陈敬伯的师生之情甚笃,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八月,党祸汹汹,相传阉党准备逮文震孟、姚希孟及刘宗周,他将儿子刘洵托付于陈敬伯。全祖望有词云:“……漫天警党祸,托孤之行亦殆而。敬伯真健者,古谊直与王成朱震堪并驰。”^{[6] (P2244)}黄锡云、傅振照《蕺山弟子考》文在陈敬伯名录下言“陈敬伯,不知何许人也。……”^[5]陈敬伯非陈尧年乎?现存文献资料尚未发现蕺山弟子之中除了陈尧年敬伯外还另有同姓同字之人。讲学石家池期间,刘宗周著酒色财气四箴示学者,他说“人生大戒,酒、色、财、气四者。”^{[7] (P341)}刘宗周从始至终的教化宗旨皆是使人成其为人,这也是他后来题名“证人社”的意旨所在,酒、色、财、气四者正是“证人”的妨碍因素。刘宗周分别阐明四者的危害“酒之为诸生病也,以昏神,以动气,以废事失时”“色之祸,昔人比之毒药猛兽”“财之为累,于读书尤属对症”“气之一字,诸生于父母、兄弟、妻子、童仆间,日可供勘。不孝、不友之罪,实坐于此”,^{[7] (P341~344)}并指出相应的戒条,如若违反则罚之或逐之。万历四十五年三月(公元1617年),刘宗周由石家池移席至韩山草堂。韩山草堂乃族兄之别业。在此讲学期间,他著《座右铭》四则、《和杨龟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吟示学者》,并编成《论语学案》等。

天启元年十月(公元1621年)刘宗周至京师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天启二年四月初五(公元1622年)即奉命赶赴南京。短短数月,他与邹元标、冯从吾等学者讲学论道,先于城隍庙之斋房(可视为首善书院之前身),后于首善书院,其间“每有疑义,必问先生云何”。^{[2] (P283)}首善书院于天启二年初由邹元标、冯从吾等所创建。当时的明朝已然是内忧外患,内有阉党,外有满兵,人心涣散趋于崩解之势,邹、冯二位大儒率同志讲明圣学,以期重振人心、士气,“虽相戒不讲朝政,但大旨仍近东林”。^{[8] (P100)}不久,在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工科给事中郭允厚、工科给事中郭兴治的不断上疏攻击下,邹元标、冯从吾先后退隐。《剑桥中国明代史》言“当皇帝下令关闭书院后,邹元标和冯从吾被迫提出辞职。”^{[9] (P579)}此语恐不准确。禁毁首善书院是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邹元标和冯从吾在此之前因受到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等人的攻击已经辞职。而此时的皇

帝对邹元标、冯从吾还比较温和，“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元标连疏请益力，诏加太子太保，乘传归”^{[10] [P6306]}（冯从吾）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四年春，（冯从吾）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辞未上，召拜工部尚书。会赵南星、高攀龙相继去国，连疏力辞，予致仕”。^{[10] [P6316]}对于复劾邹元标、将其“比之妖贼”的郭兴治，“上责其狂悖，夺俸”。^{[11] [P1040]}随着冯、邹的退隐，首善书院即告辍讲。关于冯、邹二位讲学主盟的为学风格，邹元标高“解悟”，冯从吾重“躬行”，刘宗周“以从吾之言为当，序其教言，传之”。^{[2] [P285-286]}

（二）中后期讲学活动（天启五年至顺治二年蕺山先生去世）

明熹宗逐渐沉迷于工匠工艺的同时，宦官魏忠贤的势力则越来越大，其爪牙遍布全国。天启五年三月（公元1625年，刘宗周48岁），钩党之祸愈演愈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被逮捕，尚书赵南星等被削籍，所谓“缇骑四出，削籍遍天下”。^{[2] [P293]}于此晦暗之时，刘宗周挺身而出，慨然曰：“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2] [P295]}他于五月开始讲学于蕺山解吟轩，每月举行一次讲会。是年，刘宗周倡明慎独之说。他要求学者收敛身心，于根柢处做工夫，此方是入道之基。天启五年之后，刘宗周对慎独之说继续作了详致深入的阐发。以“主敬、慎独、诚意”为为学三阶段，天启五年讲学于蕺山解吟轩则是慎独阶段的开始。刘宗周晚年（59岁）提出的诚意学说，并非另辟宗旨，亦是其慎独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这一年，明代自张居正之后的第三次禁毁书院到来。阉党视东林党以及东林书院为心腹大患，并认为其他书院与东林性质相近，故下令拆毁天下讲学书院。《明史》记载（天启五年）秋七月壬戌，毁首善书院。……八月壬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12] [P303]}首善书院先是被改为“忠臣祠”，匾额对联一应撤去，“曳先圣像，掷之城隅”，^{[10] [P6316]}后院内石碑皆被毁碎。东林书院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魏忠贤及其爪牙对东林党人肆意攻击，罗织罪名，以此来抓捕入狱。不过处此危局的刘宗周仍然没有停止讲学，孜孜不倦，孤介耿耿。是年冬，写《吊六君子赋》，表臣六君子之正直，痛斥阉党之毒厉。经高攀龙以“君子不立于岩墙之下”“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劝诫，杜门谢客，辍讲韬晦。刘宗周与高攀龙的思想有许多不同，即使

具体到生死观问题上，二人也是存在差异（高攀龙的生死观具有佛学色彩）。但刘宗周对高攀龙的“逃死之心”“求死之心”的说法全然认可，他日后“义当生自生，义当死自死”^{[13] [P644]}的表达与高攀龙此处的观点是一致的。君子不逃死，亦不求死，而是以“义”为准则。刘宗周认为，儒家如此视生死，生死则为寻常事，而不似佛教喋喋不休地以了生死为第一义，却不过是贪生怕死而已。

天启五年之后的六年、七年两年时间内，刘宗周大多是与儿子刘洵闭门读书、静坐，课读于韩山草堂，“专用慎独之功”，^{[2] [P302]}撰《做人说》《读书说》示洵。天启七年年末至崇祯元年，阉党伏诛，党祸解除。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刘宗周与陶奭龄共同商订，谋会讲学，二人为学社主盟。于这一年的上巳之日，二百多名志同道合之人聚集于陶文简公祠，讨论“致知在格物”章，讲学一月一会，此即为证人社。证人社有学檄、会议（包含会期、会礼、会讲、会费、会戒、会友）、约言、约诫，规定十分细致严格。比如约诫一共十二类（戒不孝、戒不友、戒苟取、戒干进、戒闺帷、戒贪色、戒妄言、戒任气、戒过饮、戒奢侈、戒游荡、戒惰容）、五十条，若有违反，视严重与否给予中罚、上罚或出会的惩处。

不过仅在一年之后，于崇祯五年之春，陶奭龄因与刘宗周论学宗旨不同（陶奭龄重识认本体，偏佛禅一路；刘宗周重认定本体做工夫，偏王门江右学派一路），其追随者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十几人，别会白马岩居。刘宗周亦离开陶文简公祠，讲学于古小学、阳明祠。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分化只是代表两派为学旨趣的不同，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决裂。刘宗周对陶奭龄始终是一种尊崇、谦虚的态度。他时常会去白马岩居走动，且与白马一派秦弘祐等书信往来讨论问题。刘宗周《赈岷缘起》记载，（崇祯十年）季春有白马山房之会，偶及邻邑岷灾，其民菜色……”^{[7] [P114]}这说明到崇祯十年他都有参加白马山房的讲会，并与王朝式等一起赈灾。姚名达《刘宗周年谱》中认为刘洵的《蕺山刘子年谱》在讲到“陶奭龄等别会白马岩居”时存在一大误处。即为《谱》有“先生间尝过从，一日座中举悟异同，复理前说以质，弘祐云云，先生云云，有与书弘祐云云，数致规正，诸生自信愈坚，先生遂不复与之辨矣。”姚名达认为，刘洵说“先生遂不复与之辨矣”是有问题的，因为此后刘宗周与秦弘祐等人的辨难仍有许多，他此时并未与白马一派分

裂。^{[2] [P361]} 笔者认为,姚名达所指出刘灼的这一“大误”,应属对于刘灼的误解。就具体语境来看,他们之前所辨的问题是关于“识认本体”,刘灼言“先生遂不复与之辨”,承接上文,应是刘宗周不与之辨“识认本体”之事,至少是暂时不论,而并非姚名达所理解的刘灼指出其父再也不与秦弘祐等白马一派辨难,甚至与之分裂。事实上,灼《谱》在崇祯七年一条有,刘宗周在读了秦弘祐的《迁改格》之后“乃与弘祐书”。^{[2] [P106]} 崇祯十年条目下记载:刘宗周派遣诸生去岷邑赈饥,其间有白马一派的王朝式、秦弘祐、钱永锡等。据此可以推断,刘灼应当不会前后矛盾得如此浅显,以至认为蕺山先生早前已经不与秦弘祐等辨难、进而分裂。崇祯五年之后,除了短暂的为官岁月之外,刘宗周大半处于讲学著述之中。从54岁到68岁,他有大量作品问世,完成了思想体系的系统化与成熟化。同时,以言传和身教影响了许多弟子,比如陈确、张履祥皆是其晚年高弟,他们从学时间虽然较短,却深受先师的影响。

二、刘宗周的教化特质

刘宗周的讲学生涯与思想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密切相关。讲学以其思想主张为内容,同时又会进一步促进理论的完善。当然,理论传达以及构建并非刘宗周的最终目的,其讲学旨在“证人”通过“教”而“化”之,使人成其为真正的人,从内在心性到外在形体都发生转变,即李景林先生所言“通过工夫来实现、拥有和显现本体;本体推动人的存在发生转化,并在这转化了的实存上把自身呈现出来。”^{[14] [P10]} 作为明代最后一位大儒,刘宗周的教化方式呈现出以下特质。

(一) 重本:注重未发工夫

刘宗周48岁讲学于蕺山解吟轩,这一年他开始倡明慎独理论。后于59岁正式提出诚意学说,诚意学说是慎独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在这两个阶段,他对于未发工夫的强调是一贯的。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刘宗周49岁),他有言“隐微者,未发之中;显见者,已发之和。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中为天下之大本。慎独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达道行焉,此亦理之易明者也。”^{[15] [P372]} “慎独”即在隐微的内在主宰上做工夫,“大本立”以至“达道行”皆以此为基础。未发之“中体”(“独体”)能够澄莹湛然,无丝毫染污,已发之情感、意念、言语、动作自然能够符合天理。刘宗周还以树木为喻说明,“慎

独”工夫即犹如根上的栽培灌溉之功,根源处培育得力,自然会有枝繁叶茂,因而心之本原处的工夫尤为紧要。这一时期,刘宗周对《中庸》特别重视,且以“慎独”为之宗旨,曰“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15] [P300]} 此处方是学问之根本。他批评了两种“学不知本”的“支离”之病,一是“穷理”(于事事物物上求理)。刘宗周指出,王阳明对于“穷理”的弊病已经阐明,专提“致良知”为教,当时学者们对此也已经有所认识。但是另外一种“支离”之病,学者们却没有认识到。这种工夫路向同属于心学内部,同属于在心上做工夫,所谓“同一心耳”,^{[15] [P302]} 但是“舍渊渊静深之地,而从事于思虑纷起之后、泛应曲当之间,正是寻枝摘叶之大者”。^{[15] [P302]} 刘宗周认为,此种“支离”实质上与程朱“穷理”之“支离”并无差别。他非常感慨,曰“持此为学,又何成乎?又何成乎?”^{[15] [P302]} 刘宗周于晚年对王阳明工夫论的批判也是集中于“致良知”落于后手工夫,但此时中年阶段的刘宗周,他意识到了心学内部存在“于思虑纷起后”做工夫的问题,不过还未将火力放到王阳明身上,他对于阳明先生仍处于“中信”^{[2] [P147]} 的阶段。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刘宗周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未发之说示学者”。^{[2] [P117]} 在诚意阶段,他同样强调未发工夫。刘宗周指出,“《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15] [P390]} “本”是什么?“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15] [P390]} “意”非如先儒(朱子、阳明)所言为“心之已发”,而是心之所存、心之主宰,乃至微、至善、真几。诚即慎之功,于本体处之一念未起之先,时时操之以戒慎恐惧工夫,则一立立定,无处不圆满,无处非至善。刘宗周曾以舟和舵的关系比喻心、意关系。舵的方向掌握好,舟的前行方能顺畅无虞。若能保证意之贞定,喜怒哀乐之发则如春夏秋冬之运行一般,自然畅然,生生不息。在此阶段,他对王阳明转向“辩难不遗余力”,其中批判的一个核心即是阳明于“有善有恶”之后,方去“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属于落于后手的工夫,不免手忙脚乱。因此,他对江右王学罗念庵之收摄保任说则表达了赞赏,“罗先生……特拈‘收摄保聚’四字为致良知符诀,故其学专求之未发一机,以主静无欲为宗旨,可为卫道苦心矣”。^{[13] [P528]}

刘宗周认为,若能保证本体源头处的洁净精微,自然会有万事万物之妙用,若有未发之中,自

然会有已发之和。对于个体而言,独慎、意诚则心正、身修,从内而外都会发生转化。对于国家而言,若皇上能做到慎独、诚意,则臣僚、百姓翕然从之,自然政通民和、财用增加,远人来服,此为政治之本、教化之本。而其余火器之类皆为末端之学,乃奇技淫巧以惑君心,所谓“不恃人而恃器,兵事之所以愈不振也”。^{[16] (P204)}

(二) 崇礼: 重视礼仪规矩

刘宗周的一生,是严毅清苦、耿介正直的一生。在修养工夫的践履和教授方面,他还十分重视外在的礼仪规矩,要求从举止和形象方面严格约束自己,这也是其“主敬”思想的重要内涵。刘宗周中后期虽然提“慎独、诚意”为宗,但“主敬”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慎独”之“慎”、“诚意”之“诚”亦是内心之“敬”,而外在之“敬”则通过他对礼仪规矩的重视及实践体现出来。在此,强调一念未起之先的未发工夫与重视外在的礼仪规矩并不矛盾。从根本上而言,刘宗周认为最为紧要的当然是一念未起之先的先手工夫,但是外在的恭敬也会有助于内心之存养,是颇为有效的一种助益工夫。这点与程颐有相同之处。程颐在讲“敬”时,除了内心的恭敬严肃、闲邪存诚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外表的整齐庄重。外庄则内敬,外与内相联,外表的庄重不是作伪,天长日久之后,内在的恭敬之心会逐渐生起;反之,举止闲散随便则会养成傲慢之心,所谓“言不庄不敬,则鄙诈之心生矣;貌不庄不敬,则怠慢之心生矣”。^{[17] (P7)}

刘宗周从30岁于大善寺教授同族亲属学业开始,即以“严”字立教,使之“出入进退,俱有成度”。^{[2] (P237)} 38岁于朱绵之解吟轩授业,谓“今欲学为人,请自学礼始”。^{[2] (P258)} 言动举止,皆须遵守当然之则。刘宗周说,“浅言之则小学之科条,深言之即收放心之要法也”。^{[2] (P258)} 简单来说,礼为初学者的纪律准则,深入考察,则会发现礼仪规矩为“收放心”之要法。心性之“慎”与“诚”自然会影响到外在之气质、言行,即孟子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8] (P309)} 同时,外在的言行、举止也会影响内心,整齐严肃的举止会成为心性修养的重要促成因素。晚清皮锡瑞曾有言“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器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

此”。^{[19] (P13)} 一如刘宗周《书张奠夫塾约》所言:“学者试一用之洒扫应对进退间,便有进步可窥。若更随地循循,皆作如是观法,积而不已,将向来一副习心习气,不觉次第即换去,只此便是圣人路上人。……故礼之一字,下手法亦即究竟法也”。^{[7] (P120)}

他著有《酒色财气四箴》、《家塾规》、《小学约》等,从日常生活、家庭教学到学校教育,从受学者到教学者,皆有详致具体的仪节规定。比如《家塾规》的“考德之要”部分,刘宗周规定“上堂扬声,入户下视,入市整容,处私褻必慎其独”、“视无窥,听无倾,立毋跛,行毋翔,坐毋箕踞。凡无故,不得废衣冠”。^{[7] (P426)} 等。《小学约》有“学生入学,仿效古礼,以鲜蔬四色、或米糕、或酒肉为贽见礼。初进门,亲手送贽毕,再揖,退侍立于父兄之后。主人升席,与先生交拜,凡四拜毕。主人正先生位席,南向请升座,先生辞。诸生行四拜礼,先生受二拜,答二拜。拜毕,先生升座。诸生序齿,分班对拜,行二拜礼。礼毕,诸生皆向上拱手齐立”。^{[7] (P428)} 平生甚为重要的《人谱》以及证人社亦是如此。虽然刘宗周在《人谱续篇》强调,他所列举的显过、大过、丛过、成过等外在过失皆由隐过、微过而来,所以要注重内心一念之微的“谨独”一关。但他在《人谱杂说》之《考旋篇》中记载“警游梦第一”到“警假道学第一百”,其间诸多礼仪仪节的戒条,包括“警戏动”“警谩语”“警早眠晏起”“警昼居内室”“警暑月袒”“警行不避妇女”“警科跣”等。另有《人谱续篇》“讼过法”细致描写了“讼过”(静坐)的程序,“一柱香,一盂水,置之净几,布一蒲团座于下,方会平旦以后,一躬就坐,交趺齐手,屏息正容。正俨威间,鉴临有赫……”。^{[15] (P15~16)} 《证人会约》亦是条目诸多。“会议”“约言”“约诫”之中对于会讲的时间、程序、费用缴纳以及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惩罚的方式等皆有明确规定。重修刘氏家谱,教约、家纪、家规详致清楚,“严毅”之风格跃然纸上。

不过需要阐明的是,刘宗周是严毅与随和的综合。他于自己、于门人在为学修养工夫方面的要求十分严格,从来那些行为放浪、言语不逊的人皆在他的批评之列。但是刘宗周于学术观点方面却是宽容随和的,比如他对于石经本《大学》并不因其是伪经而加以摈弃,认为条理通贯、自圆其说即可。他对于陶爽龄一派,虽然为学宗旨不同,但始终对其持尊崇的态度。陶爽龄

一派别会白马岩居,刘宗周亦是时时往来,与秦弘祐、王朝式、史子虚、史子复等时常书信论学。甚至刘宗周对于佛教也是宽容的,作为传统儒者,其自有儒佛之辨。但他也曾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表达。他不认可佛教观点,但是与洪溟上人、六如上人等几位禅师交情甚笃。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先生68岁),刘宗周绝食殉节。他以一种缓慢而痛楚的方式结束生命,正是《礼记·祭义》所言“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20] [P624]}且去世前二日“幅巾葛袍”“迁北首卧”,整齐严肃,以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讲学。

(三) 尚实: 强调笃实渐修

从教化过程而言,刘宗周强调笃实渐修。他反对顿悟,认为其有“欲速助长”之患。刘宗周指出,圣人之道,不落虚无影响之中,而须踏踏实实,盈科而进。即使是像孔夫子如此明睿之人,亦是“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一步一步臻于“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但是禅宗却“以悟性为则,一念回机,即同本得”,甚至有“旬日不会,便当截取老僧头”^{[16] [P348]}之言,事实上对于真正修养并无益处。同时,他对王门之中持“四无”之说的王龙溪持批判态度,认为其“以良知作佛性,悬空期个悟”,^{[13] [P524]}不求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伦常日用之中逐步提升,有上截无下截,终成玩弄光景。所以,刘宗周有“阳明不幸而有龙溪,犹之象山不幸而有慈湖”^{[16] [P359-360]}“象山不差,差于慈湖;阳明不差,差于龙溪”^{[15] [P518]}的评价。对于同乡周海门、陶望龄、陶奭龄,刘宗周从私人情感言,对其人品、学问均持欣赏、尊敬的态度,但是于具体观点方面则不认可,比如“无善无恶”“识认本体”等。刘宗周反对虚无影响之事,注重实修躬行。故梁启超先生言“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先生一派独盛,学风已趋健实。”^{[21] [P47]}

正因强调笃实渐修,他对门人弟子之为学进益的期待也较为宽容,不希企其一朝一夕即有根本性的转变,对“顿悟”始终保持距离。在《与履思十七》中,他说“王士美诸兄,初发心向道,正当嘉与而奖借之,亦不必先虑其异同而阻之也”。^{[16] [P352]}跟随陶奭龄的弟子多为禅佛之士,刘宗周在《答王士生美》中有“夫以阳明先生之明睿,而回环出入于二氏者二十年,及已觉其非,而犹恨旧习之缠绕,卒难摆脱,且又若干年,况后之

君子乎?吾辈于此姑且从容商订,时取其有益于坐下者,而韦弦佩之,且徐用涵育熏陶之法,以听其自化,安知无阳明先生其人出焉。”^{[16] [P351]}即使以阳明先生之明睿,多年之后仍然未能摆脱佛道影响,何况后之君子,因而要循序渐进,听其逐步发生变化。

具体到为学次第,刘宗周认为须自下而上、由小至大,有条不紊、循循善诱以化之。因而,他对为学之初始阶段的儿童教育十分重视。他说:“圣人戒阙党童子,反在速成。速成岂非美事?正恐失却小学,无以为远大之基耳。”^{[7] [P437]}“言学所以学为人、学为圣人,而其功自幼学始,故《易》称‘蒙以养正,圣功也’。”^{[7] [P40]}童蒙之时的洒扫、应对、进退十分关键,此为入道之基。于此草草放过,及长之时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学,良心日坏一日直至成为丧心之人。但是,世俗之人却轻视、忽视之,不仅仅是蒙师自轻,主家亦认为蒙学无关紧要,认为不过是引导幼童,根本无视其重要与艰巨。他在《小学约》中详细列举了小学仪节,不仅对于儿童有诸多规定,蒙师亦须谨言慎行,宽严得体。身为人师,须真心造就人才,而非仅仅为了酬劳。此外,刘宗周大力促成了古小学的重修。

三、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

从中晚明整个思想文化背景来看,刘宗周作为王学左派的修正者而出现。王学左派主张良知现成,强调顿悟本体、一任本心、顺适自然,忽视刻苦勉力的工夫。刘宗周认为良知现成一派会导致“情识而肆”“虚玄而荡”的弊病,天下士人受此影响,人心世道趋于颓靡涣散。因而,应当注重兢兢业业的渐修工夫。此外,刘宗周的严毅、清贞以及以死殉节的行为对家族、门人以及浙东学术皆有影响。而且,他的讲学教化思想对于现当代教育建设亦具有启示作用。

(一) 历史意义

刘宗周的讲学教化对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可谓“君子之德风”。刘宗周30岁给大善寺的同族讲学,即以严毅风格令旁人惊异。他辅佐家政以来,甚是严肃公正,使得原本涣散、浮薄的家族风气为之一变。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其教化宗旨、教化方式以及具体的仪则规矩仍是家族子弟尊行的典范。《蕺山刘子年谱》“崇祯七年,先生五十七岁”条刘灼按“刘氏族大风漓,最难齐一。先生佐家政以来,事无大小,无不取裁焉。大抵

示以尊祖敬宗之道,联以收族合涣之谊,情虽器,令之凛如也。服习既久,风尚一变。二十余年,通族莫有讼公庭者。先生没后,犹尊行其教不衰。”^{[2] [P106]}其子刘洵(字伯绳)朝夕受父亲之言传身教,所受助益尤大。《清史稿》有“宗周家居讲学,诸弟子闻教未达,辄私于洵。洵应机开譬,具有条理。”^{[22] [P13122-13123]}刘洵亦是端方正直之人,在其父殉国之后,他居住于蕺山一小楼之中,闭门谢客,考订先父遗著。或有官吏请见,他也严词拒绝,所往来者仅史孝咸、恽日初等数人,编有《蕺山刘子年谱》,友人私谥之曰“贞孝先生”。除了刘氏本族,章一匡(外甥)、章正宸(内侄)、王毓芝(二女婿)、章明德(母氏族侄)、陈刚(大女婿)、章立稿(姑父)、秦祖轼(小女婿)、章黻(三女婿)等亲属,皆从学于刘宗周。他们受蕺山先生的影响,亦归于端方笃实。

就学派师门言之,刘宗周的门人弟子一如其师,大多是高风亮节、忠义节烈之士。从学风言,他们经世尚实,不蹈虚空。比如门下最著名之黄宗羲,他反对空谈、提倡力行、注重实学,因而对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皆有研究。他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23] [P3]}正体现了其对于工夫的重视,比其师“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莹”^{[15] [P507]}更进一步。而当明清易代之际,弟子们则以各自的方式维护内心的道义。刘宗周绝食殉节的前后,他的十几位弟子亦以死明志,他们不屈服,不投降,凛凛气节,令人震动。其中,王毓蕃因士绅投降,自沉而死;祁彪佳在清兵攻占杭州以后,自沉而死;金铉投水自杀;吴麟征自缢而死,等等。他们的自杀的确如其师所言“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眼前止见一义,不见有生死”^{[13] [P644]}刘宗周还有言“如欲从生死上研磨,终如峭壁,非人力攀援所及,唯有一义,能将生死抹去,死之威力,至此而穷,化险阻而为平易。”^{[13] [P634]}刘宗周及其门人的殉节行为不是刻意求死以博名声,而是顺义而为,所以于他们而言,生死事虽大,但与义相较,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还有一部分弟子则拼死抗清,比如黄宗羲、叶廷秀、恽日初等。另有弟子则遁入山林或佛门,比如张应鳌、何弘仁、董场等。

从大的方面讲,刘宗周的讲学教化并不如他所期望的可以达到挽救世道人心的效果,因为在明末,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注重个性独立、享乐纵欲的浪潮滚滚而来,而且明王朝的覆灭结局已经无法挽回。不过,清初浙东学术再次兴盛而

重接经世致用之传统,其间刘宗周的作用不容忽视。刘宗周终其一生,强调工夫,力倡实行,反对空谈,对于经学、史学、政治等皆有研究,黄宗羲得刘宗周之真传,下启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廷采等学者,构成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中坚力量。

(二) 现代启示

刘宗周的讲学教化思想之中,许多内容值得现代教育借鉴。比如德育为先、笃实力行等,这些皆为教育界的通识。在此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儿童教育,二是礼仪教育。

儿童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正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4] [P2]}刘宗周在《小学约》中提出,“蒙养为极大事,亦为最难事”^{[7] [P428]}朱熹亦曾有言“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25] [P393]}儿童教育关系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因而,现当代教育领域中,应当特别加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程度,从政策制度、社会环境、家庭氛围、学校师资等各个方面出发,来全面促进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甚至可以说,建设一所顶尖幼儿园、小学远比建设一所杰出的大学重要得多。此外,须特别注意儿童教育之方式方法。如何既不对其自由形成压抑束缚,又不使之言行猖狂放浪,是为人父母、师长重要的功课。刘宗周提出宽严得体,过宽则“顽法而不率教”,过严则“畏威而生机寂然”。在教育过程中须秉持中庸之道,因材施教、因时制宜,随个体之禀赋特性而成就之。

再谈礼仪教育。礼仪仪节虽然以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存在,但其间却有真实的道德情感,即吴树勤等所言“礼仪价值规范是依据人情而确立的,人生价值是人身心情感和行为的自我开显,不是外在教条”^[26]它会通过身体行为来影响内在的心灵状态,即“直观而具体的礼乐在潜移默化之中陶冶人的道德情感,培育道德理性,其效果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来得更快更直接”^[27]单纯对于道德原则的认知并不一定会带来情感的认可与道德行为的实现,而当其以具象的礼仪形式呈现出来之时,却能以感动人心的路径使人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德精神,往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古代的婚礼、冠礼、丧礼、祭礼等都有周密的程序和规定。举行仪式的时间、地点、组织

者、参与者、流程等的确定和具体实施皆有条不紊、庄严有序。在这些看似繁琐的仪节之中,身处其中的人可以体会到婚姻的庄重、成人的担当、对于逝者的哀思与对受祭者的敬畏。刘宗周《小学约》中所规定的学生入学时的礼节,亦可以使就学者领会为学的严肃与对师长的敬重。而庄重感、担当感、哀戚、敬畏、敬重等真实的道德情感在心中升涌之时,道德理性以至道德人格则在逐渐铸成。然而当今之世,随着社会越来越快速的发展,简洁、方便、高效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礼仪仪节逐渐被忽视,往往以结果为导向,而其过程方式则不在讨论之列。有的领域中,礼仪仪节虽然存在,但却失之功利、片面甚至庸俗。比如婚礼比拼场面豪华、成人礼仅仅与高考相联、丧礼中竟以流行歌舞助兴等。因此,对于礼仪规矩的重视则尤需重提,这里不是应该说我们应该完完全全回到古代的礼仪世界之中,而是应建设、完善一套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礼仪规范,从而陶冶道德情感、陶铸理想人格。

[参考文献]

- [1] 吴震. 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2] 刘宗周. 刘宗周全集: 第6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3] 赵所生. 薛正兴. 中国历代书院志: 第7册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4]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2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5] 黄锡云. 傅振照. 戴山弟子考 [J]. 越地春秋, 2009 (1).
- [6] 朱铸禹.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7] 刘宗周. 刘宗周全集: 第4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8] 嵇文甫. 晚明思想史论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9] 牟复礼. 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 上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10]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21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2] 张廷玉, 等. 明史: 第2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3] 刘宗周. 刘宗周全集: 第5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14] 李景林. 教化视域中的儒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15] 刘宗周. 刘宗周全集: 第2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16] 刘宗周. 刘宗周全集: 第3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7.
- [17] 程颢. 程颐. 二程集: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9] 皮锡瑞. 经学概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20] 杨天宇. 礼记译注: 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21]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 [22] 赵尔巽, 等. 清史稿: 第43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3]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7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24]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5] 朱熹. 朱子全书: 第13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26] 吴树勤. 刘晓东. 传统儒家礼仪教育与民众生活价值的自我实现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4 (11).
- [27] 汤海燕. 杨明. 中国古代冠礼及其道德教育功能初探 [J]. 伦理学研究, 2011 (4).

Valuing the Arche and Advocating Etiquette and Diligent Practice: Analysis on the Lecturing Activities and Civilizing Characteristics of Liu Zongzhou

Feng Qianli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 Liu Zongzhou, together with Tao Shiling, established Zhengren Society, which was very important in his lecturing career. In addition, he lectured in Dashan Temple, Jieyin Xuan, Shijia Chi, Hanshan Thatched Cottage, Donglin Academy, and Shoushan Academy. Liu's lectures were delivered for didactic purposes.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ce acting on the arche in order to ensure its cleanness. Meanwhile, he thought people's strict abidance on the etiquette would promote them to turn into the Sage. Moreover, he advocated diligent and gradual practice against instant revelation and empty talk. Liu Zongzhou's lecturing activities and civilizing thoughts influenced his family, disciples and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 greatly. They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Key words: Liu Zongzhou; lecturing activities; civilizing characteristics; moder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李 官)